

# 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产业结构 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田野 倪红福 夏杰长\*

**内容提要** 国内国际经济循环演变伴随产业结构的变化,影响宏观劳动收入份额。本文构建了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及其因素结构分解框架,并利用1997-2020年全球投入产出表进行测算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产业内效应是影响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主导因素,在中国产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的阶段,产业结构效应也较为重要;第二,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在各阶段对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贡献方向相反,国内经济循环主导了产业结构效应的贡献,国内经济循环程度下降将降低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即国际循环(外循环)程度越大,宏观劳动收入份额越低;第三,国内经济循环中内需规模持续扩张、国内生产网络中服务业投入占比增加、国际经济循环中最终需求出口扩张以及持续深度参与国际生产网络均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

**关键词** 宏观劳动收入份额 产业结构 国内国际经济循环 投入产出表

## 一 引言

劳动收入份额大小体现了国民经济的初次分配格局,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要通过“努力提高居民收入

\* 田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倪红福(通讯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2号2号楼 100836;夏杰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电子邮箱:13419672992@163.com(田野);nihongfu\_justin@126.com(倪红福);xiajiechang@126.com(夏杰长)。

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A0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72141309)及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2023M743865)的资助,感谢闫冰倩和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完善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随着内外经济形势的转变,“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战略决策。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作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与重要目标,二者应协同共进。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动过程,从1997年的55.9%下降至2007年41.4%,随后上升至2020年的52.1%。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格局发生了由国际大循环向国内大循环的转变。中国国内经济循环程度从1997年的81.5%持续下降到2007年的71.8%,此时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对中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随后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致的全球需求不振、贸易保护主义频发等因素影响,中国国内经济循环程度持续上升到2020年的84.8%。与之对应,中国国际经济循环经历了由上升到下降的过程。那么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与其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同步变动,是历史偶然,还是具有规律性的必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利于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为实现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协同共进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一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由行业内劳动收入份额按产业占比加权加总得到,其变动可分解为产业内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当各行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或上升,而各行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发生变动时,宏观劳动收入份额会随之下降或上升,即为产业内效应。因各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存在差异,当产业结构向劳动收入份额更低或更高的产业变迁时,将导致宏观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或上升,即为产业结构效应。国内外学者从结构性因素、经济波动、技术进步偏向性、不完全竞争及经济全球化等角度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阶段进行了广泛研究(冯明和闫冰倩,2022)。这些文献对产业内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关注度更高,对产业结构的关注则稍显不足。然而,产业结构效应对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容小觑。在理论层面,王林辉和袁礼(2018)、郭凯明(2019)、林淑君等(2022)及郭凯明和王钰冰(2022)论证了产业结构变迁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影响。在定量检验层面,胡秋阳(2016)与冯明和闫冰倩(2022)的研究表明,在1997-2007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动较大的阶段,产业结构效应对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贡献达30%左右。2012年以后,中国产业结构经历了第一产业占比持续缓慢下降,第二产业占比大幅下降,第三产业占比大幅上升的变化。那么这一产业结构变化是否会对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产生较大影响?本文将回答这一重要问题。

国内国际经济循环通过要素投入供给、生产技术及最终产品销售影响产业结构。

在市场调节作用下,收入差异引导供给结构最终向需求结构看齐,所以需求结构决定了产业结构形态(沈利生,2011)。换言之,某一部门的最终产品拉动了本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增加值,进而改变产业结构。最终需求结构根据用途差异表现为消费、投资和出口等类别,由于各类最终需求在不同行业的占比不同,从而也可表现为最终需求的行业结构。需求侧的需求结构和供给侧的产业结构存在内在联系,二者可通过生产技术约束联系在一起(颜色等,2018)。因此,除最终需求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外,供给端的增加值率、体现生产技术的产业间关联程度等因素也会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李善同和钟思斌,1998)。经济循环主要包含生产、分配、流通、消费4个环节(王一鸣,2020),贯通从供给到需求的全流程。全球价值链覆盖了研发设计、制造加工、分销与运输、销售与营销、产品售后服务等完整的产品生命周期(Frederick,2019)。因此,我们可以从生产和销售环节价值增值的全球价值链视角刻画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开放经济的本质(倪红福,2022),要素供给和商品需求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跨境流动。当生产分工和最终产品销售行为仅限于一国境内的国内价值链时,称为国内经济循环,反之称为国际经济循环(黄群慧和倪红福,2021;王欠欠和田野,2022)。一国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中体现的要素供给、生产技术和最终需求结构成为该国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进而影响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本文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模型,将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引入产业结构,构建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分解的一般性框架,并对国内国际经济循环进行因素结构分解,从而回答中国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动态变迁对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问题。本文研究结论表明,相比产业结构效应,1997-2020年各阶段产业内效应对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具有主导作用。而在中国产业结构变化较大的阶段,产业结构效应的贡献也较为可观。进一步研究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发现,国内经济循环主导了产业结构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这一贡献大小在有些阶段甚至超过产业内效应。在国内经济循环中,内需规模扩大在各阶段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均有积极作用,而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网络中的投入增加也推动了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由降转升。在简单和复杂的国际经济循环中,出口最终需求的扩张和持续参与国际生产网络在各阶段均拉高了宏观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的创新和边际贡献表现为:第一,研究视角较新。鲜有文献考察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与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U型变动关系,本文考察了完整的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及其结构因素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第二,丰富了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影响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分析的相关研究。本文理论逻辑建立在经济格局变动如何影响

产业结构变动的基础上,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第三,因素结构分解方法更细致。本文将各类经济循环中的最终需求因素细分为规模大小、类别结构及行业结构等,而不是只对最终需求分类别结构考察,由此更准确地区分了最终需求类型变动和行业结构升级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为:第二部分综述文献;第三部分是理论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构建一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及其因素结构分解框架,并介绍数据来源及处理;第四部分是相关测度结果分析;最后是本文结论与政策启示。

## 二 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急剧下降的现象引发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涌现出基于资本劳动相对价格变化、劳动收入份额核算以及产业结构变动为主的相关研究。

### (一)资本与劳动相对价格变化的研究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在探究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研究中被广泛使用。资本劳动相对价格变动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最直接的因素(陈登科和陈诗一,2018),当资本价格相对较低时,会替代劳动要素,从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当劳动力谈判能力弱时,要素收入分配会向资本倾斜。现有研究主要从国内市场环境和开放经济视角展开。在国内市场环境方面,产品市场垄断(白重恩等,2008)、税收(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陆雪琴和鲁建坤,2022)、融资约束(罗长远和陈琳,2012)及地区性别失衡(魏下海等,2017)均能通过影响资本劳动相对价格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在开放经济方面,Böckerman and Maliranta(2012)认为全球化通过提高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增强资本议价能力,弱化了劳动者的谈判地位。对外贸易削弱了中国劳动者的谈判能力,从而减少劳动收入(张杰等,2012)。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过程通过降低资本品成本、中间投入品价格和技术引进成本,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杜鹏程等,2022)。国际贸易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从而导致要素收入向资本倾斜(张莉等,2012)。中国产业国际生产分割的变动影响要素价格比,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作用随中国资本积累进程不断减小,呈U型趋势(蒋为和黄玖立,2014)。基于资本劳动价格比的研究,侧重探究企业内、产业内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而对产业结构效应的关注稍显不足。

### (二)劳动收入份额核算的研究

目前劳动收入份额的核算有投入产出表、资金流量表及地区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3

个数据来源(张车伟和张士斌,2012)。劳动收入份额核算主要面临测算方法和统计口径问题,即生产税净额是否从GDP中扣除和个体经济收入中劳动报酬如何划分,这导致劳动收入份额难以进行动态跟踪和国际比较。收入法GDP核算将增加值划分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Gomme and Rupert(2004)认为生产税净额是劳动和资本之外的“楔子”,它既不属于劳动收入也不属于资本收入。如果不将其剔除,将无法反映真实的劳动和资本要素报酬的分配关系。中国生产税净额的份额在1993-2003年不断上升,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幅度被高估(周明海等,2010)。然而,关于生产税净额是否需要从GDP中剔除取决于我们关注的问题,即到底是关注要素报酬的分配格局,还是要素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配格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劳动收入份额问题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没有区分雇员经济部门和自雇经济部门(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如收入法GDP核算在2004年出现个体经济(自雇经济)业主收入从劳动收入变为营业盈余以及对农业不再计营业盈余的变化,导致2003-2004年劳动收入份额被低估6.3%(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刘长庚和柏园杰(2022)则在要素报酬和调整统计口径的基础上再次核算了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发现1978-2020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均值为68.1%,呈向右倾斜的N型变化趋势,同法国和英国的差距仅为6.7%。

### (三)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

结构性因素也是现阶段研究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重要视角。郭凯明(2019)从人工智能对产业结构影响的视角指出,产业结构变动影响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机制在于生产要素是向劳动密集型部门,还是向资本密集型部门流动。劳动密集型部门占比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宏观劳动收入份额,而资本密集型部门占比的提高将导致宏观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在结构性视角下,Solow(1958)直接从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定义出发,将其变动分解为产业内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两因素模型),为研究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提供了经典分析框架。罗长远和张军(2009)直接利用该模型考察了产业内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对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在不同阶段波动的影响。孙文杰(2012)将产业结构效应拓展为技术效率和最终需求结构两因素,重点分析最终需求使用去向、行业结构等因素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胡秋阳(2016)进一步从最终品使用的水平分工和最终品生产的垂直分工出发,将产业结构效应拓展为价值链结构和最终需求结构,以此分析1997-2007年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冯明和闫冰倩(2022)基于该思路将乘法结构分解法与对数均值迪氏指数法相结合,构建了更统一的因素分解框架,以剖析劳动收入份额U型演变的成因。此外,郭凯明和王钰冰(2022)将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和要素分配纳入一个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

型,探究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优化如何影响分配结构的演化。刘维林(2022)则构建了一个包含生产网络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框架,进一步将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分解为产业内部分配、中间品替代、价值链协作及最终需求结构,实现了Solow两因素模型向四因素模型的拓展。在经验分析上,刘维林(2022)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模型,检验了1995-2014年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进一步从生产活动和最终需求等经济循环的环节考察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

综上所述,当前解释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完整U型变动的研究并不多见,更缺乏系统探讨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影响的研究。相比现有相关研究,一是我们考察了完整的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及其因素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而不是只考察经济循环的部分环节;二是从规模水平、类别结构及行业结构3方面对最终需求结构进行更细致地考察,有助于从类别结构和行业结构双重视角更全面地探讨需求结构变动或升级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三是中国不同阶段的产业结构变动程度不一,本文将样本延长至2020年,更新的数据有助于更准确地探究不同阶段影响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U型变动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试图将产业结构效应向开放经济拓展,建立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及其因素结构分解框架,并进行了相应的测度结果分析。

### 三 理论模型与数据

本文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模型,将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纳入产业结构效应,构建一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分解框架。

#### (一)基本分解模型

在G国N部门的全球投入产出模型中,基于Solow(1958)的双因素模型,一国(以国家C为例)宏观劳动收入份额表示为产业内劳动收入份额与产业结构的乘积:

$$\begin{aligned} \frac{W^C}{V^C} &= la\_share^C = \sum_{i=1}^N \left( \frac{W_i^C}{V_i^C} \cdot \frac{V_i^C}{V^C} \right) \\ &= \left( \frac{W_1^C}{V_1^C} \quad \dots \quad \frac{W_n^C}{V_n^C} \right) \cdot \begin{pmatrix} \frac{V_1^C}{V^C} \\ \dots \\ \frac{V_n^C}{V^C} \end{pmatrix} = \underbrace{\left( w_1^C \quad \dots \quad w_n^C \right)}_{\text{产业内因素}} \cdot \underbrace{\begin{pmatrix} v_1^C \\ \vdots \\ v_n^C \end{pmatrix}}_{\text{产业结构因素}} \end{aligned} \quad (1)$$

其中, $W_i^C$ 是C国*i*部门的劳动报酬, $W^C = \sum_{i=1}^N W_i^C$ 是C国总劳动报酬; $V_i^C$ 是C国*i*部

门的增加值,  $V^C = \sum_{i=1}^N V_i^C$  是  $C$  国总增加值;  $W_i^C/V_i^C = la\_share_i^C = w_i^C$  是  $C$  国  $i$  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 即产业内劳动收入份额;  $V_i^C/V^C = v_i^C$  是  $C$  国  $i$  部门增加值占该国总增加值的比重;  $la\_share^C$  为  $C$  国劳动收入份额。

全球投入产出模型中国家行业层面的增加值可表示为:

$$V_i^C = Va_i^C \sum_{S=1}^G \sum_{j=1}^N B_{ij}^{CS} Y_j^S \quad (2)$$

其中,  $Va_i^C$  表示  $C$  国  $i$  部门的增加值系数;  $B$  为  $GN \times GN$  维全球列昂惕夫(Leontief)逆矩阵, 体现产业间联系;  $Y$  为  $GN \times G$  维全球最终需求矩阵。

在全球投入产出模型中, 有  $\sum_{C=1}^G \sum_{i=1}^N Va_i^C B_{ij}^{CS} = 1$  成立, 表示国家  $S$  部门  $j$  单位最终产出的来源正好分解完全, 其价值可以分解为来自自身和其他部门的增加值投入。因此,  $C$  国  $i$  部门的产业结构可进一步改写为:

$$\begin{aligned} v_i^C &= \frac{\sum_{C=1}^G \sum_{i=1}^N V_i^C}{\sum_{i=1}^N V_i^C} \cdot \frac{V_i^C}{\sum_{C=1}^G \sum_{i=1}^N V_i^C} = \frac{\sum_{C=1}^G \sum_{i=1}^N V_i^C}{\sum_{i=1}^N V_i^C} \cdot \frac{Va_i^C \sum_{S=1}^G \sum_{j=1}^N B_{ij}^{CS} Y_j^S}{\sum_{S=1}^G \sum_{j=1}^N Y_j^S} \\ &= \frac{\sum_{C=1}^G \sum_{i=1}^N V_i^C}{\sum_{i=1}^N V_i^C} \cdot Va_i^C \sum_{S=1}^G \sum_{j=1}^N B_{ij}^{CS} \left( \frac{Y_j^S}{\sum_{S=1}^G \sum_{j=1}^N Y_j^S} \right) = Va_i^C \sum_{S=1}^G \sum_{j=1}^N B_{ij}^{CS} y_j^S \end{aligned} \quad (3)$$

在全球投入产出模型中有  $\sum_{S=1}^G \sum_{j=1}^N Y_j^S = \sum_{C=1}^G \sum_{i=1}^N V_i^C$  成立, 因此有  $y_j^S = Y_j^S / \sum_{i=1}^N V_i^C$ , 表示  $C$  国  $i$  部门的全球最终需求结构<sup>①</sup>。

将(3)式代入(1)式, 并改写为矩阵形式, 得到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  $C$  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基本表达式<sup>②</sup>为:

$$la\_share^C = \hat{W} \hat{V} a B y \quad (4)$$

① 在一般情形下, 全球最终需求结构是指国家-部门-各类用途的最终需求占全球总最终需求的比重。然而, 由于同一年份全球总最终需求和一国增加值均为定值, 因此全球最终需求结构亦可表示为国家-部门-各类用途的最终需求占一国总增加值的比重。刘维林(2022)也采用了这一最终需求结构形式。

② (4)式是行业-国家层面的宏观劳动收入份额。(4)式和(1)式本质上是一致的, 二者转换关系为  $W^C/V^C = la\_share^C = u' \hat{W} \hat{V} a B y y$ ,  $u$  为  $GN \times 1$  维元素为1的列向量,  $y$  为  $G \times 1$  维元素为1的列向量。双边形式的宏观劳动收入份额有利于后文在产业结构中引入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因素结构分解框架和对各类因素的贡献按不同产业进行加总。

其中,矩阵 $\hat{W}$ 为 $GN \times GN$ 维国家行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对角矩阵, $C$ 国之外位置的元素为0; $\hat{V}a$ 为 $GN \times GN$ 维国家行业层面增加值系数对角矩阵,同样 $C$ 国之外位置的元素为0; $B$ 为 $GN \times GN$ 维全球 Leontief 逆矩阵,包含一国的国内产业间、国内产业与国外产业间以及国外产业间联系,刻画产业间生产活动; $y$ 为 $GN \times G$ 维全球最终需求结构矩阵,各元素为国家行业-国家层面最终需求占 $C$ 国增加值的比重,内含国内消费、国内投资、出口、进口以及其他最终需求的结构。此时 $C$ 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中产业结构( $\hat{V}aBy$ )的分子( $C$ 国行业增加值)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模型定义。由于增加值嵌入到直接或间接贸易伙伴的最终需求中,因此(4)式为行业-国家双边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按照行向加总可得各行业的劳动报酬占 $C$ 国GDP的比重,而列向加总即为 $C$ 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

### (二)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分解框架

1. 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测度。全球价值链在刻画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上具有较好的适用性。从价值增值活动视角看,全球价值链包含了研发设计、制造加工、分销与运输、销售与营销、产品售后服务等环节的完整生命周期;从供应链视角看,全球价值链包括原材料(要素)、零部件、最终产品、分销的供应链环节,供应链为最终需求市场服务(Frederick, 2019)。经济循环则主要包含生产、分配、流通、消费4个环节(王一鸣, 2020),与全球价值链各环节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近年来,涌现了大量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贸易增加值来源分解和增加值贸易核算的全球价值链测度研究,这些研究的核心是将增加值贸易流量与总值出口贸易流量区分开,这与国民经济核算中区分增加值(GDP)和总产出类似,且识别了国际贸易中增加值的来源地和目的地。相关代表性文献有 Johnson and Noguera (2012)、Wang *et al.* (2013)、Koopman *et al.* (2014)、王直等(2015)、倪红福(2016)、倪红福等(2016)、倪红福和夏杰长(2016)、Wang *et al.* (2017)、祝坤福等(2022)及倪红福和王海成(2022)等。这些全球价值链核算方法的发展,为更好测度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奠定了基础。

经济体的内外循环程度从本质上是一国经济对国内和国外的依赖程度,通常用增加值衡量一国国内国际经济循环(裴长洪和刘洪愧, 2021)。黄群慧和倪红福(2021)、王欠欠和田野(2022)及倪红福和田野(2023)基于全球价值链生产分解框架测度了国内国际经济循环,本文根据王欠欠和田野(2022)的研究定义国内国际经济循环。根据国家部门增加值涉及的生产活动区位和最终品销售活动是否跨境,对增加值进行国内和国际经济循环分解。具体地,当生产活动区位和最终品销售活动任

一项涉及直接跨境时,将这部分增加值定义为国际经济循环。反之,生产活动区位和最终品销售活动均在一国境内的增加值则被定义为国内经济循环。据此,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可被定义为:

$$V = VaBY = \underbrace{VaLY^{DD}}_{\text{国内经济循环}} + \underbrace{VaLY^{ED}}_{\text{简单国际经济循环}} + \underbrace{VaLA^F BY}_{\text{复杂国际经济循环}} \quad (5)$$

其中,  $L = (I - A^D)^{-1}$  是  $GN \times GN$  维本国 Leontief 逆矩阵,体现本国行业间的生产联系,也是对发生在本国的生产活动的刻画;  $A^F$  为  $GN \times GN$  维进口中间品投入系数矩阵;  $A^F B$  则体现了本国行业与国外行业间的跨境生产联系;  $Y^{DD}$  为本国供给且国内消费的最终需求(内需),是  $GN \times 1$  维列向量;  $Y^{ED}$  为出口到国外的最终需求(外需),也是  $GN \times 1$  维列向量。

(5)式将国家部门增加值分解为国内经济循环、简单国际经济循环和复杂国际经济循环。国内经济循环是指生产活动区位( $L$ )和最终品销售( $Y^{DD}$ )均在一国境内的经济循环。简单国际经济循环是指生产活动区位( $L$ )仍在一国境内,但国内生产的最终品被直接出口到国外( $Y^{ED}$ ),仅通过最终品出口参与国际经济,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联系。复杂国际经济循环则是指先经历国内生产活动( $L$ ),再出口中间品参与国际生产分工活动( $A^F B$ ),最后最终品在全球范围内消费( $Y$ ),生产活动区位与国外相关,是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一种更复杂的联系。

2.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分解。将国家部门层面增加值的变化按经济循环类别分解,基于(5)式可以得到:

$$D(V) = D(\hat{V}aLY^{DD}) + D(\hat{V}aLY^{ED}) + D(\hat{V}aLA^F BY) \quad (6)$$

其中,  $D$  表示变量变动,等于变量当期值减去上期值。(6)式将增加值变动分解为3部分:国内经济循环变动的贡献  $D(\hat{V}aLY^{DD})$ 、简单国际经济循环变动的贡献  $D(\hat{V}aLY^{ED})$  以及复杂国际经济循环变动的贡献  $D(\hat{V}aLA^F BY)$ 。将(6)式代入(4)式,采用两极分解取平均值的方法(Dietzenbacher and Los, 1998),得到一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分解的基本形式为:

$$D(la\_share) = \underbrace{\frac{1}{2} \Delta(\hat{w}) (\hat{V}a_t B_t y_t + \hat{V}a_{t-1} B_{t-1} y_{t-1})}_{\text{产业内效应}} + \underbrace{\frac{1}{2} (\hat{w}_t + \hat{w}_{t-1}) \Delta(\hat{V}aLy^{DD})}_{\text{国内经济循环效应}} \\ + \underbrace{\frac{1}{2} (\hat{w}_t + \hat{w}_{t-1}) \Delta(\hat{V}aLy^{ED})}_{\text{简单国际经济循环效应}} + \underbrace{\frac{1}{2} (\hat{w}_t + \hat{w}_{t-1}) \Delta(\hat{V}aLA^F By)}_{\text{复杂国际经济循环效应}} \quad (7)$$

(7)式可看作 Solow (1958) 两因素模型中产业结构效应向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

拓展,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可分解为产业内效应和各类经济循环效应。各类经济循环变动影响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基本逻辑为:在一国经济中,当某行业的产业内劳动收入份额不变时,该行业某类经济循环变动将导致该行业在国民经济GDP中的占比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例如,当某行业的产业内劳动收入份额不变时,该行业国内经济循环增加值占该国GDP的比重上升,将有利于提高该行业的劳动报酬,进而表现为该行业的国内经济循环变动对该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有积极影响,反之反是。简单和复杂国际经济循环的影响机制亦同理。

3. 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因素结构分解。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按经济循环类型分解仅能考察各类经济循环整体的贡献,无法得知各类经济循环通过何种因素或渠道影响产业结构,进而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钱纳里等(2015)在分析各国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中,利用投入产出法,将产业结构分解成中间品投入比例(增加值率)、投入产出系数、内需结构和国际贸易结构。本文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内含了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供给端增加值率、体现生产技术的产业间关联程度及最终需求结构等因素。因此,我们对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因素分解也延续了这一逻辑。其中,生产技术可进一步根据生产活动是否跨境区分为国内生产网络和国际生产网络,最终需求结构可进一步根据是否有直接贸易联系区分为内需、外需、进口需求及间接最终需求等大类。

生产活动的因素结构分解为:

$$D(B) = D(L) + D(LA^F B) = \underbrace{D(L)}_{\text{国内和简单国际经济循环中本国生产网络结构变动的贡献}} + \underbrace{\frac{1}{2} D(L)(A^F_i B_i + A^F_{i-1} B_{i-1})}_{\text{复杂国际经济循环中本国生产网络结构变动的贡献}} + \underbrace{\frac{1}{2} (L_i + L_{i-1}) D(A^F B)}_{\text{复杂国际经济循环中国际生产网络结构变动的贡献}} \quad (8)$$

对生产活动的因素结构分解实质上是在全球生产网络结构中分离本国生产网络结构和国际生产网络结构,本国生产网络结构存在于(5)式定义的3种经济循环中,国际生产网络结构则仅存在于复杂国际经济循环中。

参考Miller and Blair(2009)对最终需求在两期变动的因素结构分解方法,可将最终需求类别看作是最最终需求的产品组合。因此,本文将影响最终需求结构变动的因素分解为最终需求规模、不同类型最终需求的行业结构(或产品结构)以及最终需求的类别结构。

以国家C为例,根据C国增加值嵌入最终需求的类别,重写全球最终需求矩

阵为:

$$Y^C = [Y^{DD} \ Y^{ID} \ Y^{E1} \ \dots \ Y^{EG} \ Y^{O1} \ \dots \ Y^{OG}]_{GN \times 2G} \quad (9)$$

其中,  $Y^{ID}$  为国家  $C$  进口最终需求;  $Y^{E1} \dots Y^{EG}$  为出口到各国的最终需求;  $Y^{O1} \dots Y^{OG}$  为其他最终需求。

加总国家行业各类型的最终需求得到全球总最终需求标量, 即  $u'Y^C\beta = Y$ ,  $\beta$  为元素为 1 的  $2G \times 1$  维列向量; 对各类型最终需求列向加总得到各类最终需求的行向量, 即  $u'Y^C = Y_M$ ; 全球总最终需求在各类型最终需求上的分布结构列向量为  $d_{2G \times 1} = Y_M'/Y$ ,  $d$  中元素表示各类型最终需求占全球总最终需求的比例, 即最终需求的类别结构; 各最终需求占各类型总最终需求的比重定义各类最终需求系数矩阵, 即各类最终需求国家行业结构  $F_{GN \times 2G} = Y^C(\hat{Y}_M)^{-1}$ 。因此,  $C$  国全球最终需求可表示为全球总最终需求规模、各类最终需求国家行业结构和最终需求类别结构的乘积, 即  $Y^C = YFd$ 。我们将其代入(4)式中的  $y$ , 并对  $y$  进行两极分解取平均值形式的因素结构分解<sup>①</sup>为:

$$\begin{aligned} \Delta(y) = & \frac{1}{2} D \left( \underbrace{Y / \sum_{i=1}^N V_i^C}_{\text{最终需求规模水平变动的贡献}} \right) (F_t d_t + F_{t-1} d_{t-1}) \\ & + \frac{1}{2} \left[ \underbrace{\left( Y / \sum_{i=1}^N V_i^C \right)_t D(F) d_{t-1} + \left( Y / \sum_{i=1}^N V_i^C \right)_{t-1} D(F) d_t}_{\text{各类最终需求的国家行业结构变动的贡献}} \right] \\ & + \frac{1}{2} \left[ \underbrace{\left( Y / \sum_{i=1}^N V_i^C \right)_t F_t + \left( Y / \sum_{i=1}^N V_i^C \right)_{t-1} F_{t-1}}_{\text{最终需求类别变动的贡献}} \right] D(d) \end{aligned} \quad (10)$$

其中, 最终需求规模水平变动的贡献  $(D(Y / \sum_{i=1}^N V_i^C) = D(y^C))$  是指全球最终需求规模变化导致的全球最终需求的变动; 各类最终需求的国家行业结构变动的贡献  $(D(F))$  是指每类最终需求在不同国家行业的分配导致的全球最终需求的变动, 其中的国内消费 ( $Y^{DD}$ ) 和区分出口国的出口最终需求 ( $[Y^{E1} \dots Y^{EG}]_{GN \times (G-1)}$ ) 等两类最终需求

<sup>①</sup> 此时全球最终需求中全球最终需求规模项不再是  $Y$ , 而是  $Y / \sum_{i=1}^N V_i^C = y^C$ 。同理,  $C$  国总增加值在当年并不发生变动, 因此以其对全球最终需求规模进行标准化, 也能体现全球最终需求的规模变动。

中“国家行业”的“国家”仅为C国;最终需求类别变动的贡献( $D(d)$ )是指全球最终需求在各类最终需求上的分配,不同类别最终需求占全球最终需求的比重变动也将影响全球最终需求的变动。

结合(7)、(8)及(10)式,可得C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因素结构分解为:

$$D(la\_share)_0^C = \frac{1}{2} \underbrace{D(\hat{w})(\hat{V}a_t B_t y_t + \hat{V}a_{t-1} B_{t-1} y_{t-1})}_{\text{产业内效应}} \quad (11.1)$$

$$\begin{aligned} D(la\_share)_1^C = & \frac{1}{4} \underbrace{(\hat{w}_t + \hat{w}_{t-1}) D(\hat{V}a)(L_t y_t^{DD} + L_{t-1} y_{t-1}^{DD})}_{\text{增加值率贡献}} \\ & + \frac{1}{4} \underbrace{(\hat{w}_t + \hat{w}_{t-1}) [\hat{V}a_t D(L) y_{t-1}^{DD} + \hat{V}a_{t-1} D(L) y_t^{DD}]}_{\text{国内生产网络结构贡献}} \\ & + \frac{1}{8} \underbrace{(\hat{w}_t + \hat{w}_{t-1}) (\hat{V}a_t L_t + \hat{V}a_{t-1} L_{t-1}) D(y^C) (F_t d_t^{DD} + F_{t-1} d_{t-1}^{DD})}_{\text{最终需求规模贡献}} \\ & + \frac{1}{8} \underbrace{(\hat{w}_t + \hat{w}_{t-1}) (\hat{V}a_t L_t + \hat{V}a_{t-1} L_{t-1}) [y_t^C D(F) d_{t-1}^{DD} + y_{t-1}^C D(F) d_t^{DD}]}_{\text{国内最终需求(内需)的行业结构贡献}} \\ & + \frac{1}{8} \underbrace{(\hat{w}_t + \hat{w}_{t-1}) (\hat{V}a_t L_t + \hat{V}a_{t-1} L_{t-1}) (y_t^C F_t + y_{t-1}^C F_{t-1}) D(d^{DD})}_{\text{国内最终需求(内需规模)的贡献}} \\ & \underbrace{\hspace{10em}}_{\text{国内经济循环环效应}} \end{aligned} \quad (11.2)$$

$$\begin{aligned} D(la\_share)_2^C = & \frac{1}{4} \underbrace{(\hat{w}_t + \hat{w}_{t-1}) D(\hat{V}a)(L_t y_t^{ED} + L_{t-1} y_{t-1}^{ED})}_{\text{增加值率贡献}} \\ & + \frac{1}{4} \underbrace{(\hat{w}_t + \hat{w}_{t-1}) [\hat{V}a_t D(L) y_{t-1}^{ED} + \hat{V}a_{t-1} D(L) y_t^{ED}]}_{\text{国内生产网络结构贡献}} \\ & + \frac{1}{8} \underbrace{(\hat{w}_t + \hat{w}_{t-1}) (\hat{V}a_t L_t + \hat{V}a_{t-1} L_{t-1}) D(y^C) (F_t d_t^{ED} + F_{t-1} d_{t-1}^{ED})}_{\text{最终需求规模贡献}} \\ & + \frac{1}{8} \underbrace{(\hat{w}_t + \hat{w}_{t-1}) (\hat{V}a_t L_t + \hat{V}a_{t-1} L_{t-1}) [y_t^C D(F) d_{t-1}^{ED} + y_{t-1}^C D(F) d_t^{ED}]}_{\text{出口最终需求(外需规模)行业结构贡献}} \\ & + \frac{1}{8} \underbrace{(\hat{w}_t + \hat{w}_{t-1}) (\hat{V}a_t L_t + \hat{V}a_{t-1} L_{t-1}) (y_t^C F_t + y_{t-1}^C F_{t-1}) D(d^{ED})}_{\text{出口最终需求目的地结构贡献}} \\ & \underbrace{\hspace{10em}}_{\text{简单国际经济循环环效应}} \end{aligned} \quad (11.3)$$

$$\begin{aligned}
 D(la\_share)_3^c = & \frac{1}{4} (\hat{w}_t + \hat{w}_{t-1}) \underbrace{D(\hat{V}a) \left[ L_t(A^F B)_t y_t + L_{t-1}(A^F B)_{t-1} y_{t-1} \right]}_{\text{增加值率贡献}} \\
 & + \frac{1}{4} (\hat{w}_t + \hat{w}_{t-1}) \underbrace{\left[ \hat{V}a_t D(L)(A^F B)_{t-1} y_{t-1} + \hat{V}a_{t-1} D(L)(A^F B)_t y_t \right]}_{\text{国内生产网络结构贡献}} \\
 & + \frac{1}{4} (\hat{w}_t + \hat{w}_{t-1}) \underbrace{\left[ \hat{V}a_t L_t D(A^F B) y_{t-1} + \hat{V}a_{t-1} L_{t-1} D(A^F B) y_t \right]}_{\text{国际生产网络结构贡献}} \\
 & + \frac{1}{8} (\hat{w}_t + \hat{w}_{t-1}) \underbrace{\left[ \hat{V}a_t L_t (A^F B)_t + \hat{V}a_{t-1} L_{t-1} (A^F B)_{t-1} \right]}_{\text{最终需求规模贡献}} D(y^c) (F_t d_t + F_{t-1} d_{t-1}) \\
 & + \frac{1}{8} (\hat{w}_t + \hat{w}_{t-1}) \underbrace{\left[ \hat{V}a_t L_t (A^F B)_t + \hat{V}a_{t-1} L_{t-1} (A^F B)_{t-1} \right]}_{\text{各类最终需求行业结构贡献}} [y_t^c D(F) d_{t-1} + y_{t-1}^c D(F) d_t] \\
 & + \frac{1}{8} (\hat{w}_t + \hat{w}_{t-1}) \underbrace{\left[ \hat{V}a_t L_t (A^F B)_t + \hat{V}a_{t-1} L_{t-1} (A^F B)_{t-1} \right]}_{\text{全球最终需求的类别结构贡献}} (y_t^c F_t + y_{t-1}^c F_{t-1}) D(d) \\
 & \hspace{15em} \underbrace{\hspace{15em}}_{\text{复杂国际经济循环效应}}
 \end{aligned} \tag{11.4}$$

(11.1)–(11.4)式为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因素结构分解模型。各类经济循环可通过增加值率、生产网络结构(本国和国际)及全球最终需求结构(全球最终需求规模、各类最终需求的国家行业结构、最终需求的类别结构)对各行业的各类经济循环导致的该行业在国民经济的占比施加影响,即影响产业结构。各类经济循环中增加值率变动的的影响是指各类经济循环中初始要素投入比例的变化,当增加值率变大,而其他因素不变时,将导致各类经济循环中等量最终需求拉动的该行业增加值上升,对该行业各类经济循环增加值产生影响,进而对该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产生影响。在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下,直接消耗系数由固定比例的 Leontief 生产函数给出,因此各类经济循环中生产网络结构变动的实质是指生产技术的变动。例如,当国内经济循环制造业的生产技术中需要某一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增多,而其他因素不变时,服务业的国内经济循环增加值将会增加,可能导致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升。其他行业和各类经济循环同理。本文全球最终需求结构变动则是一国内需、外需、进口需求以及间接最终需求等各类最终需求结构变动的组合,不同类型的最终需求变动会通过影响各行业在各类经济循环各类最终需求价值链上的收益大小,进而影响各类经济循环导致的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其中各类最终需求又可进一步分解为最终需求规模、最终需求的行业结构及类别结构,从而明确各类最终需求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到底是需求规模占主导,还是需求的行业结构占主导。例如,具体到内需结构中,可以明确内需的行业结构和内需规模谁更重要,

从而明确内需影响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政策着力点。

综上,国内经济循环变动的贡献被分解为增加值率贡献、国内生产网络结构贡献、最终需求规模贡献、国内最终需求行业结构贡献及国内最终需求(内需规模)贡献;简单国际经济循环变动的贡献被分解为增加值率贡献、国内生产网络结构贡献、最终需求规模贡献、出口最终需求行业结构贡献及出口最终需求目的地结构(外需规模)贡献;复杂国际经济循环变动的贡献被分解为增加值率贡献、国内生产网络结构贡献、国际生产网络结构贡献、最终需求规模贡献、各类最终需求行业结构贡献及全球最终需求的类别结构贡献。

### (三)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来自2013版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 2013)、2022版亚洲发展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ADB MRIO 2022)及1997–2020年中国竞争型投入产出表。首先,我们将WIOD 2013和ADB MRIO 2022匹配,得到1995–2021年包括ISIC Rev3分类下32个行业、40个经济体和1个其他区域且时间连续的全球投入产出表<sup>①</sup>;其次,本文将各年份中国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中劳动报酬数据匹配到全球投入产出表<sup>②</sup>。基于上述数据处理得到的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在具体数值上与相关文献(冯明和闫冰倩,2022;刘维林,2022)中不同计算方法得到的结果不完全一致,但变动趋势是一致的,呈明显U型特征。

## 四 测度结果分析

为探究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U型变动的原因,根据前文的分解模型,本部分将测算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产业内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和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变动的贡献。本文选取的宏观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阶段为1997–2002年和2002–2007年,上升阶段为2007–2012年和2012–2020年。为初步探究新冠疫情的影响,本文也分析了2012–2018年的测算结果。全国层面的分解结果由各行业层面分解结果加总得到,当行业层面的劳动报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上升时表现为该行业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有积极作用,反之反是。测算结果中,在宏观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阶段,所

<sup>①</sup> 限于篇幅,未报告全球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分类和经济体名称,详见本刊网站([www.jweonline.cn](http://www.jweonline.cn))本文补充材料附表1和2。

<sup>②</sup> 限于篇幅,未报告数据处理细节,详见本刊网站本文补充材料附录1。

有正贡献值均表示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有积极作用;在宏观劳动收入份额上升阶段,所有正贡献值都表示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有积极作用。各类因素的贡献值含义为某一时期各因素导致的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占该时期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比重,用百分比表示。

### (一)产业内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的贡献

各行业内部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产业内效应)是影响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最主要的因素,产业结构效应的贡献相对较小(见表1)。1997-2007年和2007-2020年,产业内效应的贡献分别为71.3%和92.3%。1997-2007年,产业内效应的贡献主要由第二和第三产业主导,产业内绝大多数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sup>①</sup>。2007-2012年,第二和第三产业仅有2个行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导致第二和第三产业共同主导拉高了宏观劳动收入份额,产业内效应的贡献分别为39.2%和55.8%。2012-2020年,第二产业多数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第三产业与之相反,导致第三产业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贡献达97.5%。2012-2018年,产业内效应的贡献为82.1%,高于2012-2020年的相应贡献。尽管疫情初期不少行业的产业内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主要为第二产业内行业),导致第二产业的产业内效应的贡献下降,但疫情发生后第三产业多数行业的产业内劳动收入份额仍呈上升趋势,第三产业的产业内效应贡献变大,使2012年后产业内效应的贡献仍旧占主导地位。劳动工资增速与劳动生产率增速相对快慢的转变与劳动力市场的松紧程度变化息息相关,当劳动力市场需求大于供给时,劳动工资增速将更可能大于劳动生产率增速,从而提高行业内的劳动收入份额(冯明和闫冰倩,202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求人倍率始终在1以下,危机后则升至1以上且呈持续攀升态势。国际金融危机前多数行业劳动工资增速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速导致多数行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危机后多数行业劳动工资增速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速从而导致多数行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

产业结构效应具有较大贡献的阶段均伴随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见表1)。1997-2002年,产业结构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贡献为35.3%。在这一阶段,第一产业占比明显下降,而第三产业占比在上升。2002-2007年,产业结构效应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贡献为23.9%,其中第一产业占比持续下降,其贡献达32.9%。由于两个阶段产业结构效应均拉低了宏观劳动收入份额,最终导致1997-2007年产业结构效应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拉低作用达28.7%。2007-2012年,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幅

<sup>①</sup> 限于篇幅,未报告各行业各年份劳动收入份额,详见本刊网站本文补充材料附表3。

度均不大,产业结构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贡献仅为-2.9%。2012-2020年,产业结构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贡献达到24.2%,第三产业占比明显上升,第二产业占比明显下降,贡献主要来自第三产业。由于产业结构效应在2007-2012年和2012-2020年的贡献方向并不一致,导致2007-2020年产业结构变动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拉升的贡献仅有7.7%。2012-2018年,产业结构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贡献达到17.9%,比2012-2020年的24.2%更小。疫情发生初期产业高级化进程得以持续,2018-2020年第二产业占比从39.7%下降到37.8%,第三产业占比从53.3%上升到54.5%。

### (二)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贡献

当某行业劳动收入份额不变,该行业各类经济循环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或下降时,将使该行业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具有拉高或拉低作用,即为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变动的贡献。

第一,长期以来,国内经济循环是影响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主要经济循环,且在各阶段基本与国际经济循环的贡献方向相反(见表1)。在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呈U型变动的过程中,中国国内经济循环程度也基本同步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在1997-2007年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阶段,国内经济循环贡献为56.3%,而简单和复杂国际经济循环贡献分别为-11.1%和-16.5%。在2007-2020年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上升阶段,国内经济循环贡献为54.6%,而简单和复杂国际经济循环贡献分别为-20.5%和-26.4%。在全国层面,国内经济循环程度(国内经济循环占GDP比重)从1997年的81.5%持续下降到2007年的71.8%,随后转为持续上升趋势,2020年为84.8%<sup>①</sup>。两类国际经济循环在各阶段的变动基本与国内经济循环相反<sup>②</sup>,因此二者各阶段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方向与国内经济循环相反。2012-2018年,国内经济循环效应、简单及复杂国际经济循环的贡献分别为81.7%、-42.6%和-21.3%。对比2012-2020年的结果可以发现,疫情发生初期国内经济循环程度持续提高,由2019年的84.3%增长到2020年的84.8%,导致国内经济循环贡献变大。疫情初期中国凭借较强的工业体系以及稳产业链、稳外贸政策使出口最终品的简单国际经济循环程度反而由2019年7.75%上升到2020年的8.11%,导致简单国际经济循环的负贡献变小;然而疫情仍旧导致了跨境产业链断裂、需求不振,中国复

① 限于篇幅,未报告行业层面国内经济循环占GDP的比重,详见本刊网站本文补充材料附表4。

② 限于篇幅,未报告行业层面简单经济循环占GDP的比重和复杂国际经济循环占GDP的比重,详见本刊网站本文补充材料附表5和6。

杂国际经济循环程度由2019年7.89%下降到2020年的7.38%，导致复杂国际经济循环的负贡献变大。

表1 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总分解

年份	产业	劳动收入 份额变动	贡献合计	产业内 效应	产业结构 效应	国内经济 循环贡献	简单国际 循环贡献	复杂国际 循环贡献
1997-2002	一产	-0.043	92.4	3.3	89.1	78.4	6.5	4.3
	二产	-0.027	57.6	26.7	31.0	37.5	-0.8	-5.7
	三产	0.024	-50.0	34.7	-84.8	-69.7	-4.8	-10.2
	全国	-0.047	100.0	64.7	35.3	46.1	0.8	-11.7
2002-2007	一产	-0.025	29.0	-3.9	32.9	40.3	-4.8	-2.7
	二产	-0.019	22.4	34.8	-12.4	10.3	-10.4	-12.3
	三产	-0.041	48.6	45.1	3.4	10.0	-2.5	-4.1
	全国	-0.085	100.0	76.1	23.9	60.6	-17.6	-19.0
1997-2007	一产	-0.068	51.5	-1.9	53.4	54.4	-0.8	-0.2
	二产	-0.046	34.9	33.9	1.1	18.4	-7.2	-10.2
	三产	-0.018	13.6	39.3	-25.8	-16.5	-3.2	-6.1
	全国	-0.132	100.0	71.3	28.7	56.3	-11.1	-16.5
2007-2012	一产	-0.001	-1.1	8.0	-9.1	-0.6	-5.4	-3.2
	二产	0.028	34.6	39.2	-4.5	19.8	-9.7	-14.7
	三产	0.054	66.5	55.8	10.8	15.8	0.3	-5.4
	全国	0.082	100.0	102.9	-2.9	35.0	-14.7	-23.2
2012-2020	一产	-0.018	-53.9	4.2	-58.1	-46.9	-6.6	-4.6
	二产	-0.041	-127.2	-25.8	-101.4	-54.3	-27.4	-19.7
	三产	0.091	281.1	97.5	183.7	204.5	-6.4	-14.4
	全国	0.033	100.0	75.8	24.2	103.3	-40.5	-38.7
2007-2020	一产	-0.018	-16.2	6.4	-22.6	-13.4	-5.7	-3.6
	二产	-0.013	-11.5	18.7	-30.1	-0.9	-14.0	-15.2
	三产	0.147	127.6	67.2	60.4	68.9	-0.9	-7.6
	全国	0.115	100.0	92.3	7.7	54.6	-20.5	-26.4
2012-2018	一产	-0.026	-79.1	-0.2	-78.8	-64.1	-9.3	-5.4
	二产	-0.027	-81.7	-9.0	-72.7	-31.4	-28.9	-12.4
	三产	0.085	260.8	91.3	169.4	177.3	-4.4	-3.5
	全国	0.033	100.0	82.1	17.9	81.7	-42.6	-21.3

说明：各因素贡献率仅保留1位小数，因此表中各类因素贡献加总可能与贡献合计不完全相等。后表同。

第二,在各类经济循环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的影响中,行业层面与总体层面的贡献可能并不一致(见表1)。在多数情况下,行业层面的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程度<sup>①</sup>变动趋势与总体层面一致,并且在两个层面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贡献方向也相同。然而,不同行业规模变动差异导致该行业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程度变动方向与其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不一致。如1997-2002年,全国、第二及第三产业的国内经济循环程度下降,第一产业的国内经济循环程度微弱上升,各产业国内经济循环的变动最终导致第一和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分别下降4.0%和4.1%,导致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上升6.1%。这一变化表现在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上,第一和第二产业国内经济循环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拉低作用分别为78.4%和37.5%,第三产业则有拉高作用,贡献率为-69.7%。第一和第三产业的国内经济循环程度变动方向与其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的影响方向不一致。原因在于,虽然这一时期第一和第三产业的国内经济循环程度分别呈上升和下降趋势,但其产业规模也在发生变动。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下降,而第三产业占比明显上升。第一产业国内经济循环程度的微弱上升不足以抵消其产业规模自身的下降,第三产业尽管国内经济循环程度下降,但其产业规模大幅上升抵消了国内经济循环程度下降的影响。第二产业的国内经济循环程度和产业规模均下降。

### (三)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因素结构分解

1.国内经济循环各因素变动的贡献。第一,国内经济循环的增加值率变动在不同阶段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贡献具有不同特征(见表2)。1997-2002年,增加值率变动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总体表现出3.4%的拉高作用,2002-2007年为29.3%的拉低作用,1997-2007年总体表现为18.4%的拉低作用。2007-2012年,增加值率变动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表现为5.5%的拉低作用,2012-2020年表现为63.2%的拉高作用,2007-2020年总贡献为12.8%。一般而言,若该产业内部有较多行业的增加值率上升<sup>②</sup>,将会表现出拉高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反之反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生产分工逐渐深化,制造业中间品和生产性服务在生产活动中比重逐渐提高,从而形成对初始要素投入的替代。中国自从加入WTO,逐渐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完善国内生产分工体系,中国生产活动中的中间品投入对初始要素形成替代,

<sup>①</sup> 总体或行业层面的国内或国际经济循环程度是指总体或行业层面的国内或国际经济循环增加值占对应层面总增加值的比重。三次产业在各年份的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程度见本刊网站本文补充材料附图1-3。

<sup>②</sup> 限于篇幅,未报告各行业增加值率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本刊网站本文补充材料附表7。

导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普遍下降(刘维林,2022)。然而,随着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各行业经济效益的改善,增加值率自2012年开始拉高了宏观劳动收入份额。

表2 影响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国内经济循环因素结构分解

年份	产业	贡献合计	增加值率贡献	国内生产网络结构贡献	最终需求规模贡献	国内最终需求行业结构贡献	国内最终需求贡献
1997-2002	一产	78.4	7.6	7.0	91.2	66.2	-93.6
	二产	37.5	13.9	20.4	108.7	2.1	-107.7
	三产	-69.7	-24.9	-1.6	108.9	-46.6	-105.4
	全国	46.1	-3.4	25.8	308.8	21.7	-306.8
2002-2007	一产	40.3	-0.8	2.8	42.4	33.6	-37.7
	二产	10.3	27.0	-17.2	55.7	-8.5	-46.8
	三产	10.0	3.1	0.6	63.5	-3.5	-53.6
	全国	60.6	29.3	-13.7	161.5	21.5	-138.1
1997-2007	一产	54.4	1.8	2.7	60.2	55.0	-65.3
	二产	18.4	23.2	-5.5	79.0	-7.0	-71.3
	三产	-16.5	-6.6	0.4	77.7	-20.3	-67.6
	全国	56.3	18.4	-2.4	216.9	27.8	-204.3
2007-2012	一产	-0.6	0.1	4.9	-62.5	-13.3	70.2
	二产	19.8	-4.5	8.5	-98.1	8.7	105.1
	三产	15.8	-1.1	9.0	-112.3	-2.2	122.4
	全国	35.0	-5.5	22.4	-272.9	-6.8	297.8
2012-2020	一产	-46.9	10.3	-19.2	-102.0	-52.2	116.2
	二产	-54.3	33.5	-65.2	-175.2	-42.8	195.4
	三产	204.5	19.4	60.4	-290.8	107.6	307.8
	全国	103.3	63.2	-23.9	-568.0	12.7	619.4
2007-2020	一产	-13.4	2.9	-1.5	-74.9	-33.9	94.0
	二产	-0.9	5.4	-11.1	-121.2	-7.7	133.7
	三产	68.9	4.5	23.8	-206.2	40.2	206.7
	全国	54.6	12.8	11.2	-402.3	-1.4	434.3
2012-2018	一产	-64.1	7.6	-27.9	-80.0	-51.3	87.4
	二产	-31.4	-12.5	-9.1	-151.1	-19.0	160.4
	三产	177.3	47.7	42.3	-230.5	79.8	237.9
	全国	81.7	42.8	5.3	-461.6	9.4	485.7

第二,国内生产网络结构中的服务投入逐渐增加对提升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具有重要作用(见表2)。1997-2002年,国内生产网络结构变动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总体表现为拉低作用,主要来自第二产业,其贡献为20.4%;2002-2007年,国内生产

网络变动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总体表现为拉高作用,仍主要来自第二产业,其贡献为17.2%。第二产业在两个下降细分阶段的不同表现与中国在参与国际大循环过程中上游供应体系的逐渐发展壮大有关,本地上游制造企业供给国内经济循环的能力逐步增强,对国外中间品投入逐渐形成替代(Kee and Tang, 2016)。2007-2012年,三大产业的国内生产网络结构变动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拉高贡献较为均衡,分别为4.9%、8.5%和9.0%;2012-2020年,国内生产网络结构变动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总体表现为23.9%的拉低作用,主要来自第二产业的贡献(-65.2%),第三产业则表现出60.4%的拉高作用;类似地,由于国内生产网络结构变动在2007-2012年拉高的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大于在2012-2020年拉低的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因此在2007-2020年国内生产网络结构变动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仍具有11.2%的拉高作用,贡献主要来自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贡献逐渐占主导,原因在于服务业作为制造业生产中的关键投入,与制造业的融合趋势愈加明显,中国国内生产活动的中间品投入行业来源已经从第二产业逐步转向第三产业,生产的服务化程度不断提升<sup>①</sup>。2012-2018年,国内生产网络结构变动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总体表现为拉高作用,也主要来自第三产业的贡献(42.3%)。2012-2018年与2012-2020年总体贡献方向相反主要受第二产业的影响,疫情发生前(2012-2018年)虽然第二产业有多数行业在国内生产网络结构中投入比例下降,但下降幅度较小。疫情发生后受国内停工停产的影响,国内中间品供给能力变弱,导致2018-2020年第二产业绝大多数行业在国内生产网络结构中的投入比例大幅下降,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表现出较大的拉低作用。

第三,国内经济循环中最终需求规模效应在样本期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持续表现为明显的拉低作用,国内最终需求则持续表现为拉高作用,然而国内最终需求行业结构在各阶段的作用不尽一致(见表2)。首先,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快于全球,因此以全球最终需求与中国GDP之比衡量的最终需求规模呈持续变小趋势。这种变动趋势最终不利于提高各行业的占比,产生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拉低作用。其次,国内最终需求行业结构效应在1997-2002年和2002-2007年均表现为拉低作用,贡献率分别为21.7%和21.5%;两阶段复合后1997-2007年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拉低作用为27.8%。2007-2012年也表现为拉低作用,贡献率为-6.8%;2012-2020年则表现为拉高作用,贡献率为12.7%;2007-2020年国内最终需求行业结构变动总体表现为1.4%的拉低作用。出现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最终需求主要拉动自身行业的增

<sup>①</sup> 限于篇幅,未报告各行业国内生产网络的变动情况,详见本刊网站本文补充材料附表8。

加值(沈利生,2011)。在各阶段国内最终需求中第一产业占比持续下降,导致该行业持续拉低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第二产业的多数行业占比经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第三产业与之不同,占比呈持续提升的趋势<sup>①</sup>。内需的行业结构呈向第三产业迈进的升级趋势,其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表现出明显的积极作用。最后,各阶段各行业的国内最终需求变动均表现出拉高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其原因为内需规模(内需与全球最终需求之比)持续扩大所致,中国内需占全球最终需求的比重从1997年的2.92%持续增长到2020年的16.63%,因此在1997-2007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2007-2020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阶段,内需规模的拉高作用分别为204.3%和434.3%。内需规模扩大有利于提高国内经济循环增加值,进而拉高了国内宏观劳动收入份额。2012-2018年各类最终需求结构对宏观收入份额的影响大小不及2012-2020年,这表明疫情初期并未改变各类最终需求结构在2012-2018年期间的变动趋势。

2. 简单国际经济循环各因素变动的贡献。第一,在简单国际经济循环中,增加值率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贡献逐渐从拉低作用转为略微拉高(见表3)。1997-2002年和2002-2007年增加值率的拉低作用分别为2.2%和7.7%,1997-2007年总体表现为5.9%的拉低作用;2007-2012年和2012-2020年分别表现为0.5%的拉低作用和3.5%的拉高作用,2007-2020年增加值率变动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总体表现为拉高作用;总体而言各阶段受第二产业的影响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经济循环和简单国际经济循环的增加值率总体贡献方向并不完全一致。原因在于国内经济循环和简单国际经济循环的最终需求结构有所差异,导致相同比例的增加值率变动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方向存在差异。

第二,简单国际经济循环中国内生产网络结构变动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贡献逐渐从由第一产业主导向第二和第三产业共同主导转变。1997-2002年,国内生产网络结构变动贡献为3.8%的拉低作用,主要来自第一产业的贡献(3.3%);2002-2007年,国内生产网络结构变动表现为6.3%的拉高作用,贡献主要来自第一(-2.6%)和第二产业(-4.5%)。2007-2012年,国内生产网络结构总体表现为5.7%的拉高作用,贡献主要来自第二(2.6%)和第三产业(2.4%);2012-2020年,国内生产网络结构总体表现为2.7%的拉低作用,拉低作用也主要来自第二产业(-10.2%),拉高作用主要来自第三产业(8.6%)。各产业在不同阶段的贡献同样表现出中国国内生

<sup>①</sup> 限于篇幅,未报告各年份国内最终需求的行业结构,详见本刊网站本文补充材料附表9。国内最终需求的第三产业占比从1997年的0.3109增长到2020年的0.4786。

## 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产业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产中间品投入的行业来源已经从第二产业逐步转向第三产业,生产的服务化程度在提升。与国内经济循环的情形较为相似,2012-2018年,简单国际经济循环中国内生产网络结构变动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总体表现为拉高作用,也主要来自第三产业的贡献。

表3 影响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简单国际经济循环因素结构分解

年份	产业	贡献合计	增加值 率贡献	国内生产网 络结构贡献	最终需求 规模贡献	出口最终需求 行业结构贡献	出口最终需求目 的地结构贡献
1997-2002	一产	6.5	0.6	3.3	6.7	4.3	-8.4
	二产	-0.8	2.4	1.1	18.3	0.8	-23.4
	三产	-4.8	-0.7	-0.6	7.3	-1.2	-9.6
	全国	0.8	2.2	3.8	32.3	3.9	-41.4
2002-2007	一产	-4.8	-0.1	-2.6	4.6	2.7	-9.4
	二产	-10.4	7.8	-4.5	13.0	-1.7	-25.1
	三产	-2.5	-0.1	0.8	4.6	2.0	-9.8
	全国	-17.6	7.7	-6.3	22.2	3.0	-44.2
1997-2007	一产	-0.8	0.2	-0.4	6.9	5.0	-12.4
	二产	-7.2	6.1	-2.5	18.1	-0.8	-28.1
	三产	-3.2	-0.4	0.4	6.0	0.8	-9.9
	全国	-11.1	5.9	-2.5	30.9	4.9	-50.4
2007-2012	一产	-5.4	0.0	0.7	-7.5	-2.4	3.8
	二产	-9.7	-0.4	2.6	-20.8	-1.2	10.1
	三产	0.3	-0.2	2.4	-8.4	1.6	4.8
	全国	-14.7	-0.5	5.7	-36.7	-2.0	18.7
2012-2020	一产	-6.6	1.0	-1.1	-9.7	0.7	2.5
	二产	-27.4	2.8	-10.2	-28.2	0.1	8.1
	三产	-6.4	-0.3	8.6	-18.0	0.2	3.1
	全国	-40.5	3.5	-2.7	-56.0	1.0	13.7
2007-2020	一产	-5.7	0.4	0.2	-8.3	-1.5	3.6
	二产	-14.0	0.6	-1.6	-21.1	-0.6	8.7
	三产	-0.9	-0.3	4.8	-11.7	1.3	5.1
	全国	-20.5	0.7	3.5	-41.2	-0.8	17.4
2012-2018	一产	-9.3	0.7	-2.9	-7.4	1.1	-0.9
	二产	-28.9	-2.8	0.6	-23.8	-1.4	-1.5
	三产	-4.4	2.2	8.1	-15.1	2.2	-1.9
	全国	-42.6	0.1	5.9	-46.3	2.0	-4.2

第三,简单国际经济循环中最终需求规模效应在样本期持续拉低了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出口最终需求的行业结构在各阶段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不同,出口最终需求目的地结构则持续表现出拉高作用(见表3)。首先,出口最终需求行业结构在1997-2002年和2002-2007年表现为拉低作用,分别为3.9%和3.0%,1997-2007年总体表现为4.9%的拉低作用。2007-2012年表现为2.0%的拉低作用,2012-2020年则表现为1.0%的拉高作用,2007-2020年总体表现为0.8%的拉低作用。各阶段各产业的贡献均不大,原因在于出口最终需求的行业结构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具体为最终品出口的行业结构未明显向服务业转移<sup>①</sup>。其次,出口最终需求的目的地结构在整体和行业层面均拉高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其中1997-2007年为50.4%的拉高作用,2007-2020年表现为17.4%的拉高作用。无论最终需求出口目的地如何改变,最终需求总出口呈扩张趋势,中国去往各目的地的外需之和占全球最终需求的比重从1997年的0.54%持续增长到2020年的1.74%。2012-2018年与2012-2020年出口最终需求目的地结构效应贡献方向相反。其原因可能是在疫情发生后,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凭借门类完整的产业体系稳外贸,最终品出口增长较快,进而提升中国外需在全球最终需求中的比重。

3.复杂国际经济循环各因素变动的贡献。第一,复杂国际经济循环的增加率变动、国内生产网络结构、最终需求规模等因素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贡献方向与简单国际经济循环基本一致,仅大小不同(见表4)。各行业复杂国际经济循环与简单国际经济循环比重基本处于同步同趋势变动,两者对各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的影响方向相似,这些共有因素导致复杂和简单经济循环增加值的变化情况相似,但因存在最终需求结构和生产技术的差异,从而表现出各因素的贡献大小不同。

表4 影响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复杂国际经济循环因素结构分解

年份	产业	贡献合计	增加值率贡献	国内生产网络结构贡献	国际生产网络结构贡献	最终需求规模贡献	各类最终需求行业结构贡献	全球最终需求的类别结构贡献
1997-2002	一产	4.3	0.4	2.4	-4.5	4.6	0.7	0.7
	二产	-5.7	0.3	2.5	-29.0	16.4	2.5	1.6
	三产	-10.2	-1.1	0.0	-23.2	11.5	0.6	2.0
	全国	-11.7	-0.4	4.9	-56.7	32.5	3.8	4.3

<sup>①</sup> 在各阶段各产业内进出口占比下降或上升的数量差异并不大。出口最终需求的行业结构见本刊网站本文补充材料附表10。

## 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产业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续表)

年份	产业	贡献合计	增加值率贡献	国内生产网络结构贡献	国际生产网络结构贡献	最终需求规模贡献	各类最终需求行业结构贡献	全球最终需求的类别结构贡献
2002-2007	一产	-2.7	-0.1	-1.3	-4.6	3.1	0.3	-0.2
	二产	-12.3	7.8	-4.2	-27.5	12.3	0.0	-0.7
	三产	-4.1	0.0	0.8	-11.2	7.3	-0.1	-0.9
	全国	-19.0	7.8	-4.7	-43.3	22.8	0.3	-1.8
1997-2007	一产	-0.2	0.1	0.4	-6.0	4.6	0.6	0.1
	二产	-10.2	5.2	-1.6	-31.6	16.6	1.2	0.1
	三产	-6.1	-0.5	0.6	-15.9	9.5	0.2	0.0
	全国	-16.5	4.7	-0.6	-53.6	30.7	2.0	0.3
2007-2012	一产	-3.2	0.0	1.2	0.7	-5.0	-0.3	0.3
	二产	-14.7	-0.9	2.8	1.6	-18.4	-0.7	1.0
	三产	-5.4	-0.3	2.4	3.2	-11.2	-0.3	0.9
	全国	-23.2	-1.2	6.3	5.4	-34.6	-1.2	2.1
2012-2020	一产	-4.6	0.7	-1.5	4.1	-6.7	-0.2	-1.0
	二产	-19.7	5.0	-9.7	12.7	-22.9	-2.0	-2.9
	三产	-14.4	-0.6	7.3	2.4	-20.0	-1.0	-2.5
	全国	-38.7	5.1	-3.9	19.2	-49.5	-3.2	-6.4
2007-2020	一产	-3.6	0.2	0.3	2.0	-5.6	-0.2	-0.3
	二产	-15.2	1.2	-1.8	5.9	-18.9	-1.1	-0.5
	三产	-7.6	-0.5	4.7	4.0	-14.8	-0.6	-0.4
	全国	-26.4	0.9	3.2	12.0	-39.4	-1.9	-1.2
2012-2018	一产	-5.4	0.5	-2.2	2.2	-5.2	-0.1	-0.5
	二产	-12.4	-2.3	0.3	12.1	-20.8	-0.7	-1.0
	三产	-3.5	2.6	7.4	6.2	-18.2	-0.2	-1.3
	全国	-21.3	0.9	5.5	20.5	-44.3	-1.0	-2.9

第二,国际生产网络结构变动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在各阶段均表现为拉高作用,且该作用主要来自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贡献(见表4)。1997-2002年,国际生产网络结构贡献为56.7%,其中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贡献分别为29.0%和23.2%;2002-2007年,拉高作用为43.3%,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贡献分别为27.5%和11.2%。2007-2012年,拉

高作用为5.4%,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拉高作用分别为1.6%和3.2%;2012-2020年,拉高作用为19.2%,其中第二产业拉高作用达12.7%。各阶段第二和第三产业多数行业在国际生产网络嵌入程度的加深,都有利于提高这些行业复杂国际经济循环增加值,进而提升该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sup>①</sup>。由此可见,中国以出口中间品的形式逐步深度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对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2012-2018年,国际生产网络结构变动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贡献为20.5%,略高于2012-2020年的贡献。疫情冲击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形成了一定阻力,有少数行业在国际生产网络中的投入比例增长趋势发生了逆转。

第三,相较而言,复杂国际经济循环的最终需求行业结构和最终需求类别结构对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并不大(见表4)。1997-2020年,中国经济从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逐渐转变为内向化发展,参与国内国际生产分工模式发生较大变化,从而导致各阶段中国复杂国际经济循环的最终需求类别结构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拉动方向不同。

##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如何实现构建新发展格局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同步,对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优化初次分配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产业结构出发,引入国内国际经济循环,构建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分解框架,检验了产业内效应、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变动对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贡献。主要研究发现:第一,长期以来,各行业内部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是影响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最主要的因素。在1997-2007年和2007-2020年,产业内效应的贡献分别为71.3%和92.3%。产业结构效应具有较大贡献的阶段均伴随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第二,国内经济循环变动对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与其趋势同步,而国际经济循环与之基本相反,国内经济循环主导了产业结构效应的贡献。在1997-2007年,国内经济循环贡献为56.3%,而简单国际经济循环和复杂国际经济循环贡献分别为-11.1%和-16.5%;在2007-2020年,国内经济循环贡献为54.6%,而简单国际经济循环和复杂国际经济循环贡献分别为-20.5%和-26.4%。第三,在国内经济循环方面,国内生产网络结构变

<sup>①</sup> 各年份各行业国际生产网络结构由各行业在其他行业的单位最终需求生产的投入份额加总得到,具体数值见本刊网站本文补充材料附表11。

动中服务投入比例提高和内需扩大对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简单国际经济循环中的出口最终需求目的地结构效应(外需持续扩大)持续拉高了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国际生产网络结构变动是复杂国际经济循环拉高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因素,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协调发展有利于提高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第四,疫情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和国际生产网络结构的变动趋势,进而对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产生了不利影响。如受疫情冲击影响,中国少部分行业持续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趋势受阻,各类经济循环的国内生产网络结构变动贡献中的第二产业拉低作用大幅增加。

以上关于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变动、产业结构变动与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关系的研究结论,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完善分配制度提供了启示。第一,在国内统一大市场构建中着力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本文测算结果表明,国内大循环程度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因此,当前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不仅有利于应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促进经济平稳健康持续发展,还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完善初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鉴此,充分发挥国内大市场优势,加快建设统一开放有序的国内大市场,促进消费投资协同、提升供给质量,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实现国内需求的规模扩大、潜能释放、适配更好、成效显著。第二,中国应持续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第三产业占比上还有较大差距,服务业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仍具有很大潜力。服务业发展要实现规模和占比的跃升,完善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基础。持续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延伸,发展科技服务业,支持服务业专业化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的深度融合,夯实实体经济发展基础。第三,夯实产业基础能力,完善国内生产网络,拓展外部需求市场,实现高水平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完善产业创新发展整体环境,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实现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和产业技术基础等工业“四基”的突破,提升产业竞争力,为完善国内生产网络和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提供支撑。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实行延链、补链、建链、强链、稳链,完善国内生产网络,增强国内经济循环的抗风险能力。在最终品出口领域,注重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的拓展,把握“一带一路”、RCEP等机遇,开拓拉美、非洲等国际市场。提升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竞争力,建设服务贸易强国,实现中国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的全流程、多环节参与,全面增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

## 参考文献:

- 白重恩、钱震杰(2009):《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第3期。
- 白重恩、钱震杰(2010):《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世界经济》第12期。
- 白重恩、钱震杰、武康平(2008):《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经济研究》第8期。
- 陈登科、陈诗一(2018):《资本劳动相对价格、替代弹性与劳动收入份额》,《世界经济》第12期。
- 杜鹏程、刘睿雯、张烁珣(2022):《要素成本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最低工资与进口关税的证据》,《世界经济》第2期。
- 冯明、闫冰倩(2022):《我国劳动报酬份额“U型”演变两阶段的驱动因素研究与国际比较》,《统计研究》第6期。
- 郭凯明(2019):《人工智能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管理世界》第7期。
- 郭凯明、王钰冰(2022):《供需结构优化、分配结构演化与2035年共同富裕目标展望》,《中国工业经济》第1期。
- 胡秋阳(2016):《产业分工与劳动报酬份额》,《经济研究》第2期。
- 黄群慧、倪红福(2021):《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测度分析——兼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管理世界》第12期。
- 蒋为、黄玖立(2014):《国际生产分割、要素禀赋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与经验研究》,《世界经济》第5期。
- 李善同、钟思斌(1998):《我国产业关联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特点分析》,《管理世界》第3期。
- 刘维林(2022):《新发展格局下全球生产网络与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经济研究》第10期。
- 刘长庚、柏园杰(2022):《中国劳动收入居于主体地位吗——劳动收入份额再测算与国际比较》,《经济动态》第7期。
- 林淑君、郭凯明、龚六堂(2022):《产业结构调整、要素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经济研究》第7期。
- 陆雪琴、鲁建坤(2022):《投资税收激励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东北增值税转型试点的证据》,《经济学(季刊)》第6期。
- 罗长远、张军(2009):《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罗长远、陈琳(2012):《融资约束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吗?——基于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第3期。
- 倪红福(2016):《全球价值链中产业“微笑曲线”存在吗?——基于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方法》,《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1期。
- 倪红福、龚六堂、夏杰长(2016):《生产分割的演进路径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生产阶段数的考察》,《管理世界》第4期。
- 倪红福、夏杰长(2016):《中国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及其变化》,《财贸经济》第10期。
- 倪红福(2022):《新发展格局下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一个逻辑框架》,《经济体制改革》第3期。
- 倪红福、王海成(2022):《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及其结构变化》,《经济研究》第2期。
- 倪红福、田野(2023):《中国经济双循环的动态变迁与国际比较——引入要素权属异质性的全球价值链分解新框架》,《经济学(季刊)》第5期。
- 裴长洪、刘洪愧(2021):《构建新发展格局科学内涵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6期。

## 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产业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 钱纳里、鲁宾逊、塞尔奎因(2015):《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王松宝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 沈利生(2011):《最终需求结构变动怎样影响产业结构变动——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2期。
- 孙文杰(2012):《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演变趋势及其原因——基于最终需求和技术效率的视角》,《经济研究》第5期。
- 魏下海、董志强、蓝嘉俊(2017):《地区性别失衡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理论与经验研究》,《世界经济》第4期。
- 王直、魏尚进、祝坤福(2015):《总贸易核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
- 王一鸣(2020):《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管理世界》第12期。
- 王欠欠、田野(2022):《中国经济双循环的测度及增长结构分解》,《经济学动态》第11期。
- 王林辉、袁礼(2018):《有偏型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迁和中国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经济研究》第11期。
- 颜色、郭凯明、杭静(2018):《需求结构变迁、产业结构转型和生产率提高》,《经济研究》第12期。
- 张杰、陈志远、周晓艳(2012):《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抑制效应研究——基于微观视角的经验证据》,《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7期。
- 张莉、李捷瑜、徐现祥(2012):《国际贸易、偏向型技术进步与要素收入分配》,《经济学(季刊)》第2期。
- 张车伟、张士斌(2012):《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非典型”特征及其解释》,《人口与发展》第4期。
- 周明海、肖文、姚先国(2010):《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度量与解释的研究进展》,《世界经济文汇》第6期。
- 祝坤福、余心玓、魏尚进、王直(2022):《全球价值链中跨国公司活动测度及其增加值溯源》,《经济研究》第3期。
- Böckerman, P. and Maliranta, M. “Globalization,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Labour Share Change: Evidence on the Determinants and Mechanisms from Longitudinal Plant-Level Data.”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012, 2, pp.259–280.
- Dietzenbacher, E. and Los, B.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Techniques: Sense and Sensitivity.” *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 1998, 4, pp.307–324.
- Frederick, S. “Global Value Chain Mapping,” in S. Ponte; G. Gereffi and G. Raj-Reichert eds., *Handbook on Global Value Chain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9, pp.29–53.
- Gomme, P. and Rupert, P. “Measuring Labor’s Share of Income.” FRB of Cleveland Policy discussion paper, No.7, 2004.
- Johnson, R. C. and Noguera, G. “Accounting for Intermediates: Production Sharing and Trade in Value Add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 86(2), pp.224–236.
- Kee, H. L. and H. Tang. “Domestic Value Added in Exports: Theory and Firm Evidence from Chin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106(6), pp.1402–1436.
- Koopman, R.; Wang, Z. and Wei, S. J. “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2), pp.459–494.
- Miller, R. E. and Blair, P. D. “Input-Output Analysis: Foundations and Extens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Solow, R. M. "A Skeptical Note on the Constancy of Relative Shar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8, 48(4), pp.618–631.

Wang, Z.; Wei, S. J. and Zhu, K. "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 at the Bilateral and Sector Levels." *NBER Working Papers*, No.19677, 2013.

Wang, Z.; Wei, S. J.; Yu, X. and Zhu, K. "Measures of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Global Business Cycles." *NBER Working Papers*, No.23222, 2017.

##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ycle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hanges in the Aggregate Share of Labour Income

Tian Ye; Ni Hongfu; Xia Jiechang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ycles is accompanied by change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aggregate share of labour income.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decomposition framework fo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ycles and its factor structure of macro-labour income share changes, and the global input-output table from 1997 to 2020 is used for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1) The intra-industry effect is the dominant factor producing changes in China's macro-labour income share at each stag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effect is also significant when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undergoes major changes. (2)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and that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ycle to changes in the macro-labour income share at each stage are opposite.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plays a dominant role in contributing to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effects, the decline in the degree of domestic economic circulation will reduce the macro-labour income share. In other word, the greater 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ycle (external circulation), the macro-labour income share is lower. (3) The expansion of domestic demand scale in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make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ntribution at all stages. The gradual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service inputs in the domestic production network is also conducive to increasing China's macro-labour income share. The expansion of final demand exports and the structural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ycle further exhibit considerable positive effects at different stages.

**Key words:** macro-labour income share, industrial structur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ycles, input-output model

**JEL codes:** F63, F13

(截稿:2023年10月 责任编辑:吴海英 王 徽)